



清晨,第一缕阳光尚未浸透海河边的薄雾,音符便已从音乐学院琴房的窗口飘然而出。它或许是肖邦练习曲的轻巧触键,或许是弦乐器流淌的整段音阶,又或许是木槌接触打击乐器瞬间清越的叮叮咚咚。这声音像一颗投入静谧水面的石子,而后,更多的乐音涟漪般漾漾开来——长笛的轻吟、巴松的低诉、箫的沉郁、笙的悠远……各种或流畅或断续的乐段,与海河的流淌声交织、应答,构成了这座城市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的交响曲。天津的“节奏”,深植于城市文化基因,它在乐器与旋律间传承、碰撞,在对话与融合中演进、升华。

一、水陆码头的韵律启蒙

九河下梢,七十二沽。天津生来便是一座被水声与号子声环绕的城。独特区位,让它注定成为一个巨大的声音的融合体和共鸣箱。南来的漕船,不仅载来江南的稻米与丝绸,也运来了昆腔的水磨婉转、徽调的质朴清新、江南丝竹的细腻缠绵;北方的商队与驼铃,“裹挟”着晋陕梆子的高亢苍凉、燕赵民歌的慷慨激昂。这座城市,仿佛一个天然造就的乐器,以城市为琴身,以海河为弦,而那南腔与北调,便是按响琴弦的种种指法。它天生“懂得”吸纳、沉淀,并将来自各方的音调,融汇成自己独特的声腔与节奏。

留声机与广播电台的普及让这场听觉的融合实验进入了千家万户。在某个天津家庭的客厅,留声机的钻石唱针可能刚播完一张梅兰芳《贵妃醉酒》的唱片,主人又换上了另一张唱片,施特劳斯《蓝色多瑙河》那华丽的圆舞曲旋律便随之流淌而出。无线电波则更显神奇,京剧的西皮二黄、苏州的评弹、上海的流行歌曲、好莱坞电影的爵士配乐、苏联的进行曲……所有这些音响,不受阻隔地涌入同一双耳朵。尤其是那时风靡全国的上海的“时代曲”,如周璇的《天涯歌女》等,将西方华尔兹的节奏骨架,与中国江南民间小调的旋律巧妙融合,创造出既摩登时髦又亲切上口的全新听觉体验,深刻影响了天津一代青年的审美趣味。

由此,传统的“锣鼓经”、曲艺的“板式”,开始与西方进行曲的刚健齐整、爵士乐切分音的灵动跳脱有了交集。在天津人的耳膜与文化潜意识中交织、碰撞、对话。一种更自觉的融合探索,在音乐家与知识分子的心中悄然萌发。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应用西方的乐理,又如何让中国的旋律在世界的和声中获得新生。

三、音乐教育的复调织体

当融合的渴望从街头的随性哼唱、茶馆的即兴伴奏中沉淀下来,天津这座城的节奏便自然而然开始寻求一种更为稳固的形态。专门

织得格外绵密而扎实。这个时期,为日后天津音乐的更加个性飞扬、多元碰撞的变奏与华彩,提供了宽阔、沉稳而充满力量的坚实动力。

四、潮流交汇的听觉图景

当音乐的探索积累了足够的技术储备与体系经验,一个更为广阔的声音空间便自然面向天津敞开。新媒体加快了全球流行文化的涌入速度,本土的创作意识也同步跟进,音乐的节奏迸发出无数个性的分支,迅速重构了城市的听觉版图。那是一个潮流澎湃的音乐时代,以其丰富的节奏语言,成为情感表达、代际认同与文化探索的一个活跃区间。

港台地区的流行音乐以其新颖的编曲与亲切的语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种以个人情感输出为主的抒情模式。邓丽君歌声中的婉转柔情,罗大佑吉他弹唱中的深沉思索,齐豫嗓音里的空灵诗意……它们带来的不仅是新鲜的旋律,更是一种建立在吉他轻柔的分解和弦与扫弦节奏上的、私密而倾诉式的聆听体验。很多青年人抱着六弦琴,在校园与街头模仿、传唱,于个人化的节奏中,寻找内心的回响。

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更具冲击力的节奏力量。崔健的《一无所有》以其粗犷的吉他失真、坚定如心跳的鼓点与充满生命力的呐喊,标志着一场深刻的音乐变革的到来。摇滚乐的内

特别是年轻人的视野。在短视频平台,年轻的演奏者用古筝疾速弹奏流行金曲或动漫主题曲,指尖在21根琴弦上舞蹈,古老乐器与现代旋律碰撞出惊艳的火花,收获数万人点赞;音乐现场,说唱青年将天津快板独有的韵律与方言俚语的幽默感,巧妙植入嘻哈音乐的节奏框架,演绎出道地的、充满烟火气的津门风情,形成独特的“津味说唱”;音乐节舞台上,身着高定华服、形象时尚的青年民乐演奏家,让琵琶、竹笛同电声乐队和炫目的电子音效同台竞演,碰撞出璀璨的火花。在“网红”茶馆或者咖啡馆,背景音乐很有可能是爵士乐队用布鲁斯风格即兴演绎的中国民歌小调。这种融合、尊重传统的“韵”,但大胆采用街舞、嘻哈的节奏型,吸引了大量年轻受众,让传统节奏在当代脉搏中迸发出新的强音。

数字技术的浪潮,在生产与传播的底层逻辑上,重塑着音乐的节奏。短视频平台的“秒响”文化,要求音乐必须在三到五秒内用最抓耳的旋律“钩子”抓住观众,也催生了将传统曲艺“极限加速”、电子化、碎片化后再创作的一些网络“神曲”。传统节奏以这种极致浓缩的方式,重新“闯入”大众的耳畔。而音乐流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则根据个人的收听习惯,塑造着个性化的“听觉茧房”。节奏,在这个时代,既是全球共通的潮流,也前所未有地个性化。

与此同时,线下社区、基于地域与情感的一些节奏仪式,也在蓬勃复苏,成为一种温暖的社会黏合剂。公园里,老年合唱团在手风琴的伴奏下纵情高歌《我的祖国》,歌声整齐划一,充满力量。公园里的某个角落,戏曲票友们一板一眼地唱着《铡美案》,韵味十足。夜幕下,广场舞的配乐可能是最流行的网络歌曲,也可能是用电子节奏重新混音的老歌。这些自发组织的音乐活动,节奏整齐,参与感强,塑造了强大的集体情感,人们在其中获得的不仅是娱乐,更是社交、归属与身份的认同。有趣的是,在这些活动中,融合以最自然的方式发生。合唱的间歇,可能会有人来上一段地道的天津时调。广场舞的曲目中,很可能就有一首重新编排、动感十足的《茉莉花》。

六、生生不息的都市乐章

纵观近一个半世纪的沧桑音轨,从漕运号子的原始呐喊到交响诗篇的宏伟壮丽,从茶园鼓书的市井韵味到数字音浪的波涛澎湃,天津城的乐音和节奏,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审美范畴,沉淀、淬炼成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性格与生活哲学。

它体现为一种刻入肌理的“把握时机”。这种精准,不仅在于相声演员“抖包袱”时那令人叫绝的寸寸火候,也在于民间乐师即兴伴奏时心领神会的“托腔保调”,更在于这座城市面对历史潮流时,那种善于在变动中捕捉节点、在流动中锚定方向的务实智慧。不冒进,不拖沓,总能踩在点上。

它体现为一种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这座城市的“精神胃袋”足够强健。三弦与提琴、快板与爵士鼓、河北梆子与电子音乐……这些看似“对立”的节奏体系与美学观念,在天津的舞台上、街巷中,在人们的耳机里,可以并行不悖,各美其美。而且,它们还会相互打量、试探、碰撞,最终催生出生像“津味摇滚”“津味说唱”这样既保留了本土基因又充满现代气息的新颖文化变体。这种包容,绝非被动接纳,而是主动咀嚼、消化与再造,最终将一切异质元素化为自身的营养。

它更体现为一种乐观豁达的“乐和乐和”的韧性。无论顺境逆境,天津人总能从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拍子,用幽默化解压力,用艺术装点日常。茶馆里为一句“现挂”爆发的满堂喝彩,公园里不顾旁人目光的引吭高歌,海河岸边民间乐队的演奏演唱,甚至是下班路上随口哼出的小曲……它们都是这种坚韧、乐观生命力的鲜活注脚。节奏,在这里是呼吸,是脉搏,是面对生活所有起伏时,那份保持从容的内在韵律。

如今,天津的“听觉景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层次、更立体。学院的先锋探索、剧场的经典演绎、音乐节的潮流呐喊、街头的个性表达、社区的温暖共鸣、虚拟世界的音响流量……所有这些声音的脉络、层次与回声,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丰饶而复杂的音乐听觉生态。天津的乐音展现出来的真正的魅力所在,或许并不在于它固执地保存了某种“纯粹”的、未经打扰的原始节奏,而在于它以一种惊人的开放性、适应性与创新性,让每一个时代的乐音都在此留下独特的声音纹理,并在永不间断的对话、创造、扬弃与再创造中,谱写着一曲波澜壮阔、生生不息、永无尾声的都市交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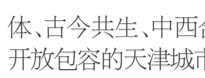
徽章上的天津文化(十八)

河海通津景物新

罗丹



沽上丛话



作为“津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的“河海文化”是以运河、海河、海洋三重水脉为根基的复合型地域文化。它以“运河贯通历史,海河塑造空间,海洋驱动未来”为逻辑主线,体现出多元一体、古今共生、中西合璧的生态特征,也涵养了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的天津城市精神。

有关天津市区海河干流和滨海新区人文景观徽章,其中天后宫、天津站、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等景观的徽章,已在“徽章上的天津文化”专栏发表的文章中专门介绍,而“天津之眼”摩天轮、意式风情区等景观,则更多地以文创产品来呈现,所以本文仅介绍几处有代表性的人文景观的徽章。

在子牙河、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岸上,矗立着一座18米高的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1983年9月11日,新中国成立后首个跨流域大型供水工程——引滦入津工程正式通水,将清澈甘甜的滦河水送入津城的千家万户。1984年9月11日,天津市邮票公司发行了引滦入津工程通水周年纪念封,其中镶嵌一枚圆形铜质纪念章。章面主图是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基座上伫立的汉白玉雕塑人物形象。这是一位年轻妇女,体态端庄而优美,面带慈容,右臂怀抱待哺的婴儿,左手向上托举,像在捧接自天而降的甘露。

在狮子林桥与金汤桥之间的海河东岸,坐落着中国传统园林建筑风格的李叔同故居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复原了原粮店后街李叔同故居,2008年落成,2011年正式对外开放。2020年发行的一枚“李叔同(弘一大师)诞辰140周年”纪念章,合金镀银,圆形,正面为李叔同晚年头像和“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之语,背面图案则是天津李叔同故居大门,门楣高悬“进士第”匾额。李叔同之父李世珍(筱楼)于清代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该匾额相传为晚清重臣李鸿章题写。这枚纪念章向世人昭示,从海河边的进士第走出了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大师、佛学大师李叔同。

海河两岸风光旖旎,干流上的近三十座桥梁也各具风采,令人赏心悦目。其中最具有地标性的桥梁当数解放桥。该桥于1927年建成,为双叶立转式开启桥,旧时每日定时开启,大小船只畅通无阻。时至今日,解放桥的每次开合,都成为吸引众人拍照打卡、惊掠朋友圈的热门景观。近百年来,解放桥的形象广泛出现在商标、广告和影视片的镜头中,也出现在一些徽章上。例如1987年发行的一枚“气化津城·造福人民”大铜章,是天津朝着能源现代化利用迈开关键一步的纪念品,图案中的解放桥显然是天津和海河的标志。

坐落在海河与解放北路之间的利顺德大饭店,始建于1863年,是天津开业最早的重要外资饭店,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著名场所,很多中外名人曾于此下榻,很多中外条约曾于此签订。1987年发行的一枚利顺德大饭店(海河边的新厦)开业纪念大铜章,铸有该饭店的店徽;以一艘三桅帆船为核心图案,象征“一帆风顺”,寓意饭店在历史长河中乘风破浪,持续发展。这一设计不仅呼应了其作为百年酒店的航海文化渊源,也体现了中西合璧的人文底蕴。

东临渤海的滨海新区,拥有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滨海新区图书馆中心馆、妈祖文化园等众多文博场馆和旅游景区。其中目前国内唯一有航母可以参观的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以苏联海军退役航母“基辅号”为主体,已成为集编队观光、主题演出、国防教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军事主题公园。我存有一枚“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留念”圆形铜章,作为核心展示元素的航母以正在航行的姿态出现,上有翱翔的海鸥,下有翻腾的海浪,增添了画面的动态与层次感,海洋文化气息十分浓郁。

题为1987年发行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新厦开业纪念章。

罗丹的系列文章“徽章上的天津文化”至此已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刊将连续刊发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系列文章“津派文化的文学表达”。

——编者

满庭芳

第五四三期



一座城 的音乐年轮

周名赫 赵妍

过去的运河边,船工的号子是这座城原始而雄浑的节奏源。那不是随意呼喝的劳动号子,而是一种高度组织化、艺术化的声音标识。一人领唱,众人应和,那呼喊的节奏与弯腰、发力、挺身的动作严丝合缝,每一句的起承转合都充满力量与韵律。铿锵整齐的集体呼喊,体现了天津人的气血,也影响了地方的文化,塑造了地方的筋骨。如广受天津人喜爱的河北梆子,唱腔高亢激越,节奏鲜明,其奔放淋漓的风格,契合了天津作为码头城市求新、求快、求鲜明的审美趣味,因而广为流传。

街头与茶园是天津的乐音和节奏提炼、淬火、升华为精致表演艺术的重要场景。竹板、八角鼓等打击乐器,音色清脆明快,节奏富于变化。它们首先在码头、市集、街巷间,“砸”出了清脆、响亮、求一个“帅”劲儿的美学认知。当表演风吹日晒的街头转入灯火通明、茶香氤氲的茶馆戏园,节奏便从实用的伴奏,升华为叙事与抒情的神韵所在。京韵大鼓大师刘宝全的节奏处理出人化,疾时如暴风骤雨,密不透风,缓时如溪流幽咽,余韵绵长。在“紧拉慢唱”“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的绝妙掌控中,千军万马的沙场、缠绵悱恻的国情、市井人物的悲欢,尽在这节奏的疾徐张弛间流转浮现。天津的观众,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熏陶中,练就了一双鉴赏节奏的“金石耳朵”。他们走进戏园子,不单是去“听戏”,更是去“听板”“听劲儿”“品味儿”。演员台上气口一个不顺,尺寸一个拿捏不准,台下的倒影或是瞬间的冷场,便是最严格的评判。正是这份来自民间、近乎严苛的审美市场,将天津锻造成了北方曲艺无可争议的高水平考场,也锤炼出了天津人那种对音乐与节奏近乎本能的敏感、挑剔与高超的鉴赏力。

二、中西合璧的声部叠响

19世纪后期,开埠的钟声与汽笛,让传统的东方韵律开始了结构迥异、和声丰富的全新乐章。管风琴的鸣响、铜管乐队的嘹亮、三角钢琴的典雅……这些西方乐音,起初与老城茶馆戏园中弹性十足的“板眼”平行而奏,彼此陌生。

然而,天津这座城的实用主义与码头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很快便催生了奇妙的“本土化”实验。小号与萨克斯,率先融入天津一些民间红白喜事的鼓乐班子。当嘹亮的小号与民间的唢呐在婚庆队伍中交织竞奏,当萨克斯略带忧郁的音色为丧礼增添了一抹特别的“洋气”与庄严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杂而充满生命力的乐音出现了。这是两种节奏思维、两种情感表达方式的初次握手与试探性融合。

培养音乐人才的院校,开始探索服务社会的途径。这一过程并非单一的旋律延伸,它宛如一部复调音乐——多条清晰而质地各异声部同时展开。它们平行、交错、应和,共同编织出厚重而丰富的时代乐段。

一条专业而高亢的声部由音乐艺术学院奏响。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建成,在天津的八年,它的影响深远而具体。它创办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小学与天津市音乐小学等,让音乐更多地影响了少年的日常。专业教师通过电台电波,将乐理知识、中外名曲的故事娓娓道来,音乐常识“飞”入寻常百姓家。音乐专业的师生们走进工人文化宫、纺织厂和学校,指导业余乐队,培训基层音乐教员,将合唱的和谐、合奏的规范,手把手地植入火热的生活中土壤。这条脉络,以其系统的学院“语法”,为天津的音乐感知潜移默化地校准着音高与节拍。

随后,一条底蕴更深的声部,也开始昂扬响起。以中央音乐学院留津的师资与资源为坚实基础,天津音乐学院成立。天津的音乐艺术由此也拥有了自己的专业教育核心。理论作曲、器乐、声乐、音乐师范等系科相继设立,勾勒出从中小学到大学相对完整的教学链条。缪天瑞、许勇三、陈振铎等一批音乐家在此传道授业。在课堂上,西方音乐理论体系与中国的民族乐器被并列探讨。笙、笛、二胡、琵琶、唢呐等民族乐器,不再仅仅是民间艺人的谋生饭碗,它们在大学里,经历着演奏技法整理、视奏乐谱规范和乐器改良的过程。演奏民族乐器的师生尝试组建民族管弦乐队,探索着如何让诸如《春江花月夜》的婉转线条,在多声部的烘托下,流淌出波澜壮阔的新气象。

同时,音乐也并未局限于大学的围墙,它在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了另一条充满生命力的共鸣声部。专业与民间,在此形成了生动的对位与应答。天津音乐学院与音乐家协会、群众艺术馆等定期举办的“双周音乐会”“音乐欣赏会”,成为市民生活中的文化沙龙,曲目贯通中西,且常辅以深入浅出的讲解,悄然提升了一座城市的听觉品位。电台的电波中,经常“流淌”着由师生们精心录制的音乐作品,经典与新作反复奏响。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键盘乐器手风琴受到广泛欢迎,产自天津的手风琴一度畅销全国。这些乐器明快而铿锵的节奏,为情感炽热的年代,激荡起坚定而昂扬的脉搏。专业音乐艺术院校的建立、社会生活的共鸣、音乐本体的转译,在天津人的文化生活中交织、对位、相互支撑。天津的“复调织体”编



在核心是一种精神的释放和表达的直白,其节奏是身体性的,充满突破与重建的力度。迪斯科舞厅里强劲而简单的四拍子节奏,引领身体舞动起来。天津本土的摇滚乐队也在这股潮流中破土而出,它们用掺杂着津腔的演唱,融合了本地曲艺节奏元素的音乐,表达着对城市生活的观察与情感。

这一时期,在音乐厅与高等音乐学府,也结出了累累硕果。天津音乐学院鲍元恺教授创作的《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便是这样一部集大成的作品。作曲家以西方交响乐丰富的和声、配器与结构语汇为笔,深情而精致地描绘出中国民歌的另一幅灵魂画卷。这部诞生于天津的作品,其意义远超一地一域,它向世界证明了,中西音乐可以在极深的审美层次、情感层次上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孕育出极具感染力的全新艺术生命。它不仅是中国音乐教育的一座高峰,更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

五、当下未来的交响共生

21世纪,全球化与数字技术的浪潮,将天津的音乐节奏生态卷入一个空前多元、复杂、共生与快速迭代的新纪元。音乐的边界在不断创新、融合的速度与方式呈现出无限可能。

在天津音乐学院、天津茱莉亚学院,融合的探索早已超越了旋律嫁接的初级阶段,进入了音乐语言本体对话与创造的“深水区”。作曲专业的师生,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兼具中国神韵与世界声音的作品。演奏家的培养理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学费中西”成为新的标准。民乐系的学生不仅要精通《二泉映月》《十面埋伏》,也要能完美演绎如《引子与回旋》《野蜂飞舞》等移植作品;管弦系的学生则在苦练帕格尼尼、柴可夫斯基之余,必须深入研究《梁祝》等中国经典作品,理解其中的韵味。

“国潮”的兴起,让传统乐音以最出乎意料,也最时尚炫目的姿态,强势回归公众视野,

明前茶飘香

吴建



清明时节,细雨如烟,山野间浮动着一抹清润的气息。这气息是一种清冽的、略带甜涩的芬芳——茶香。

清明的茶山,此时最是热闹。天刚蒙蒙亮,茶农便已上山。他们多是少妇、老妪,头上包着蓝布巾,腰间系着竹篓,动作快且轻,唯恐伤了茶芽。茶芽这东西,娇贵得很,受了伤,便失了味道。采茶人三三两两散在青翠的茶空间,手指翻飞如蝶,摘取那初绽的嫩芽。露水未干,茶芽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被采茶人摘下,据说这样的茶芽最为上乘。茶农们说,这叫“露水青”,用这些茶芽制成的茶叶,泡开来香气最足。我想,这大约与“晨露未晞”的意境相仿吧。

我曾住在江南小住,见过那里的茶事。茶农采回的茶芽,须得尽快炒制。炒茶可是一门手艺,火候稍差,便前功尽弃。我见过一位老茶农炒茶,铁锅烧得微红,茶叶入锅,他双手如飞,不停地翻炒。茶叶在锅中“啾啾”作响,渐渐由青转黄,由黄转褐,最后蜷曲如螺。满屋茶香,熏得人几欲醉倒。

清明的茶之所以珍贵,在于它是一年中的头采。经过一冬的蛰伏,茶树积蓄了足够的养分,初春萌发的嫩芽,蕴含着最浓郁的滋味。这滋味,有人说是“苦尽甘来”,初入口时

微苦,继而回甘,最后满口生津。茶之一物,最是奇妙。同一棵茶树,因采摘时节不同,味道便大相径庭。清明前的茶,称为“明前茶”,最为名贵;清明后谷雨前的,称为“雨前茶”;次之;再往后,茶叶渐老,便多做粗茶老叶了。时间之于茶,犹如命运之于人,早一步,晚一步,结局迥异。

城里人饮茶,讲究器具、环境,什么紫砂壶、玻璃杯,什么茶道、茶艺,花样百出。而山里的茶农,只用一个粗瓷碗,抓一把新茶,沸水一冲,便咕咚咕咚喝下。他们饮的是芽茶,是生活本身的味道。这种饮法,虽不雅致,却自有一种粗犷的真实。茶叶入水,缓缓舒展,犹如人与人际遇,起起伏落。初时蜷曲,继而舒展,最后沉淀。茶水的颜色,由浅入深,由清变浊,复又澄清。饮茶人观此变化,或许能悟出几分道理。

茶香飘过千年,浸润了多少文人的笔墨。苏轼写“且将新火试新茶”,陆游说“晴窗细乳戏分茶”,李清照云“酒阑更喜团茶苦”,皆因茶而生出无限诗意。清明雨霏,茶山更显青翠。采茶人的歌声,穿过薄雾,飘向远方。新炒的茶芽,正在竹匾中晾晒,等待有缘人的品尝。这一缕茶香,贯通古今,在清明时节的微风中,轻轻摇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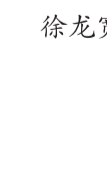
春风悄悄吹绿江南的柳丝,染青江北的麦田。湛蓝的天幕下,一只只灵动的风筝,让千年诗意与民俗,在南北长空里相依共舞。风筝,古时南方称鸢,北方称鸢,一句“南鸢北鸢”道尽了它在南北大地的不同风情。

相传春秋时期,滕州的墨子耗时三年,以木料制成木鸢,虽仅飞一日便坠落,却开启了人类追逐天际的序幕。后来曲阜的鲁班以竹子改良了材质,让这“飞天之器”更显轻盈,到了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轻便的纸张取代了木竹,“纸鸢”(风筝)越飞越高,成为寻常百姓的消遣之物。

早期的风筝曾用于军事,韩信借助风筝测量未央宫地道的距离,梁太师萧翎被困时,也曾以纸鸢传递求救信息。只是后来,风筝的军事功能渐弱,娱乐与民俗的意义愈发凸显。春回大地,放风筝成了南北共有的民俗。江南的风筝,如同江南的烟雨,精巧灵动,多是软翅模样,绘着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放飞时低回盘旋,似与江南的春风低语。江北的风筝,则透着北方的豪情,多为硬翅造型,大者如巨龙盘旋,小者似雄鹰展翅,色彩浓烈,放飞时直冲云霄,伴着呼啸的风声,尽显雄浑之气。这些年,风筝之都潍坊的风筝越做越大,越做越精彩,数百米的长龙风筝照样能放飞到空中,成为春日天幕下一道独特的风景。

江南江北风筝飞

徐龙宽



古往今来,有不少文人墨客将风筝的风情定格在笔墨之间。陆游在《观村童戏溪上》中,以“竹马跟蹒冲淅去,纸鸢跋扈挟风鸣”的诗句,描绘出江南村童放风筝的野趣。风筝在风中振翅,声响嘹亮,尽显奔放与洒脱。寇准在《纸鸢》中写“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借风筝的扶摇直上,抒怀明志,藏着文人的豪迈与洒脱。江南的风筝,又浸在“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的温婉中,路德延的诗句,将江南孩童扎制、放飞风筝的细腻场景娓娓道来,透着江南的灵秀与雅致。孔尚仁笔下的“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索骂天公”,将孩童盼放飞风筝的童趣写得活灵活现。高骈《风筝》一诗“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更写出了风筝带哨飞行的灵动,风入竹哨,声如筝鸣,更添几分诗意。

十里春光下,江南的风筝掠过小桥流水,江北的风筝翱翔于沃野长空,不同的风貌,却有着相同的欢喜。古人放风筝,放的不只是闲适,还藏着祈福的心意。清明时节,人们放飞风筝,待风筝升空后剪断引线,任其随风而去,寓意带走灾祸与烦恼,寄托对平安顺遂的期许。当下,春光明媚,江南江北的天空中,风筝灵动翩跹。那些流传千年的诗句,那些延续至今的习俗,也随着多彩的风筝,在长空里飞舞,共谱一曲欢乐祥和的春日华章。